



新国学研究丛书

英帝国与中国西藏

(1937-1947)

张永攀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汕头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新国学研究丛书

英帝国与中国西藏

(1937-1947)

张永攀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帝国与中国西藏 (1937 ~ 1947) / 张永攀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新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87 - 7 - 5004 - 6110 - 4

I. 英… II. 张… III. 英国—侵华事件—史料—西藏—
1937 ~ 1947 IV. K29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578 号

特约编辑 李登贵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王华
责任印制 郑以京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1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永攀，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陕西省榆林市人，1975年生，2003年西北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曾担任《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汕头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2006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英）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发表有论文二十余篇及编著《历史研究50年总目》等，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14

1937年至1947年是英帝国直接渗透西藏的最后十年，其通过“前进政策”、“七点行动计划”、“控制前进手段”、“蒙古地缘带计划”、“色拉山口（sela）调整计划”等手段，在西藏达旺、察隅、珞瑜地区逐步推进其势力。同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英帝国依照二战的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变换其西藏政策。

策划编辑：陈 彪

封面设计：王 华

总 序

王富仁

“新国学”是在原有“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仍然只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今，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日起，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

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的“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来,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丛书》的刊行,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任何一部专著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行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丛书》是汕头大学211工程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它的出版得到了汕头大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2005年10月15日
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结论	1
第一章 英帝国与中国西藏门、珞、察地区及其相关政策	12
第一节 英印“前进政策”与“控制前进手段”	12
一 英印政府“前进政策”的提出及推行	12
二 怀特南及英印的“控制前进手段”	27
第二节 卡罗与“蒙古地缘带计划”	39
一 卡罗“蒙古地缘带计划”的提出	39
二 西隆会议与英印向麦线以南推进的部署	49
第三节 英国在麦线以南地区的活动及与西藏地方的交涉	55
一 英国在麦线以南地区的推进和西藏噶厦的抗议	55
二 古德与西藏噶厦关于麦线问题的交涉	84
三 英国的印藏边界调整计划与对策	94
四 霍普金森出使拉萨及与噶厦的交涉	100
五 印度独立前夕英国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活动	104
第二章 中英关于西藏政治地位的交涉及英国内部对藏政策的争论	112
第一节 英国外交部建议取消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的“宗主权”与 《艾登备忘录》	112
一 英国外交部建议取消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112
二 七·二三决议和艾登备忘录	124
第二节 英印古德等人与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瀚的交涉	133

2 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 5

一 英印派遣古德赴藏	133
二 英印政府对沈宗濂入藏办理签证的阻挠	138
三 英印政府与沈宗濂的初次交涉	144
四 古德、沈宗濂与西藏噶厦	148
五 古德与沈宗濂的谈判	153
第三节 英国政府内部对西藏政策的争论	157
一 英国准备修订对藏政策的“背景”及内部争论	157
二 中国国民政府的西藏自治决议及英国内部对藏政策的统一	165
第三章 英国对国民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干涉与破坏	174
第一节 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与英印政府的活动	174
一 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入藏及英国的干扰	174
二 英国派遣古德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及与吴忠信的交涉	179
三 所谓宋子文的“对藏宣言”	186
第二节 中印日玛线与英国的干涉活动	191
一 国民政府筹建中印公路日玛线	191
二 英国阻挠修建中印公路日玛线	198
第三节 印藏驿运线与英国的干涉活动	204
一 印藏驿运线的筹划与英国的阻挠活动	204
二 英国对中国国民政府出兵西藏的干涉	210
第四节 英印的军事援藏和文化渗透	221
一 1943年后英国对藏的军事援助及其目的	221
二 英国对西藏的文化渗透	229
结束语	233
附录	242
一 英印侵藏机构、官员及其任职时间	242
二 地名及人名对照表	242
二 基本参考资料及书目	247
后记	252

绪 论

—

18世纪开始，英国先后将喜马拉雅山诸地区的西藏藩属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归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中国西藏从此成为英国觊觎的目标。19世纪末，英国、俄国、法国对亚洲的殖民地争夺加剧。俄国入侵帕米尔高原后，渐渐逼近英属印度的北部。同时，法国从西渗入暹罗，与俄国联合对英属印度构成了“钳形攻势”。英国极力想打破俄法联盟而挣脱这种包围圈，于是发动两次侵藏战争，希望把自己的势力渗入中亚腹地的西藏。^①

1907英俄协约中的《西藏协定》签订后，英俄矛盾已缓解。因此英国重新调整其西藏政策，即从亚洲收缩战略防线，充分利用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加强印度的防御，希望通过边界的重新勘订，建立一条利于印度防卫战略的印藏边界线。于是，英国极力以各种许诺诱惑十三世达赖喇嘛。1910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英国事务大臣穆莱就指示英印政府“宜利用时机优待达赖喇嘛私人，以增进西藏之友谊”^②。在英印的拉拢下，达赖喇嘛一改当年“仇英”初衷，转而向英国人靠拢。当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督明托（Minto）在加尔各答会晤时，达赖喇嘛表示“1908年的‘英藏通商条约’望予承认”。接着，1913年排挤汉人的水牛年文告又给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定了基调，使西藏上层政教人士中的少数亲英分子有恃无恐，与英国打得火热。次年，英国终于策划了侵略西藏的

^① 参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贝尔：《西藏的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本。

新阴谋——“西姆拉会议”，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松弛，诱使西藏签订了非法的英藏通商章程。更重要的是，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代表还背着中国秘密通过私人通信方式划出一条印度北部与西藏的边界线，即后来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将中国西藏西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印。虽然《西姆拉条约》以中国未正式签署而失败，但是英印已经大体上确定了中印边界东段的战略边界走向，准备再伺机抛出这一非法条约，完全取得“战略边界”政策的胜利。^①

20世纪20年代，亚洲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在帝俄取得了革命胜利，十月革命在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印度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这直接冲击和动摇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基础。1921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印度人民一致抵制英国的政府机关、法院和学校，抵制英货。在联合省、旁遮普和马德拉斯，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希望继续深入控制西藏，建立起一堵高原之墙，将北部俄国共产主义和亚洲印度民族运动隔离起来。但英国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总原则，并不愿意因西藏问题而激怒中国，而使中国结好日本或美国。所以在西藏政策上，英国采取了“缓冲”和“武装西藏”的双重政策，即在对华保持友好的前提下，给西藏噶厦提供少量军事援助，稳固汉藏边界。1921年8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Robert Curzon）发表声明，要求中英之间以1914年《西姆拉条约》为基础，重开西藏问题谈判，否则英国将放弃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且直接与西藏商定协议，“并拟飭驻江孜商务委员随时前往拉萨办理交涉”及支援藏军^②武器。这标志着英国正式实行“武装西藏”的政策，图谋把西藏变为英国把持下的武装割据地区。

然而，20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盛极一时的英帝国已渐露衰态，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已不及日本和美国。在英属印度，政府被迫同意印度大资产阶级参政。在西藏，英国的“武装支援”政策也不容

^① 有关“战略边界”、“缓冲国”等观点，请参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第12页。

^② 原西藏地方武装部队简称藏军。是为了维护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利益、镇压农奴暴动、抵抗外来侵略者而组织起来的，历史上这支军队在配合清军抗击准噶尔、廓尔喀、英军的入侵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战时期藏军分为10个营，除驻江孜和日喀则的第十营人数为900人外，其他地方驻防者均为500人，大多驻防于汉藏边界一带。

乐观，自从达赖喇嘛依靠英国人施行新政、布防汉藏边界以来，西藏内部的政局并没有好转。新政触动了僧侣及世家大族的利益，“武装西藏”使噶厦军费开支过大，财政空虚，更严重的是中上层藏军军官依靠英人支持，以莱登拉和察绒为首的西藏亲英分子图谋发生政变，对达赖本人构成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采取果断措施，解散英国的军事培训班，撤销察绒藏军司令职务，拒绝英国派人入藏申说辩解。1925以后，达赖喇嘛开始力求恢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英国的“武装西藏”政策遭到了失败。

1925年开始，对于英国和英属印度来说，是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在工党的推动下，英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国大党带领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了沉寂时期，由于英国失去达赖喇嘛的信任，英国准备在西藏推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即低调支援西藏，让西藏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其享受的“事实上的独立”。但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甚为关注，在约法中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28年蒋介石接见达赖喇嘛代表罗桑巴桑。1929年赴内地的班禅又成立班禅驻京办事处。西藏政府也派遣贡觉仲尼等人前往内地商议藏事，1930年刘曼卿和谢国梁先后奉命入藏，更是加深了中央政府和西藏的感情。然而，一直希望维持西藏现状的英国人看到国民政府与西藏密切的接触后，大为不满。1931年英国又策动西藏向青海出兵，再次希望以“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但随着1933年6月青藏双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康藏纠纷结束，英国人仍然是两手空空。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自从英属印度成立后，英国人便把西藏作为侵略目标之一，为了实现其险恶目的，英国不断实行着各种西藏政策。从侵蚀喜马拉雅山诸国开始，到进军拉萨，再到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无一不渗透着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主义野心。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由于英国张伯伦内阁的绥靖政策，英国政府貌似“公正”，奢谈“和平”，不仅不谴责日本的侵华罪行，反而趁机开始加紧侵略西藏地区。在1947年8月印度独立前的十年时间里，英国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构筑印度东北边境防御体系为借口，谋求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未实现的领土目标，另一面又以“有条件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为幌子，歪曲西藏的政治地位，拉拢西藏“亲英派”，怂恿“西藏独立”，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从而制定出干涉西藏事务的种种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英帝国开始衰落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突然高涨的时刻。把握这一时期英帝国对藏政策的变化发展,可以清楚地认识英国制定侵占“麦线”以南领土的具体策略,以及英国与西藏噶厦、国民政府的种种交涉。这对于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探明中印边界纠纷的起源,揭露英帝国对我国领土的非法攫取,否认印度在1987年非法成立的阿鲁纳卡尔邦(Alunachal Pradesh)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西藏政策的影响下,政局到底如何?西藏是如同英国所申明的“它(西藏)已经维持了30年事实上的独立”,还是仍然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这对于批判目前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叫嚣的“西藏独立”、“大西藏民族主义”是重要的证据。

二

英国侵藏史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相关著述较多。然而关于二战期间英国的对藏政策,囿于资料,历来却探讨较少。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英国侵藏史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相关著述较多。关于1937—1947年英国侵略西藏活动的研究概况,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

1.在中印边界研究方面,英国与印度的学者成果颇丰,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学界更是掀起了对“麦线”研究的热潮,他们对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的历史情况、阿萨姆部落的早期情况、麦克马洪线的起源及西姆拉会议等问题均有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诸多著述。其中英国学者兰姆(Lamb. A)于1966年在伦敦出版的《麦克马洪线(1904—1914年)》一书,就是该时期有关麦线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此书系统地探讨了1904年英军侵藏战争至1914年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英印政府和麦克马洪爵士关于印藏边界勘定问题,尤其是披露了麦克马洪爵士玩弄手段,阴谋攫取中国西藏领土的诡计。正如美国学者鲁宾和P. 阿尔夫雷德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对该书的述评时说:“麦克马洪在西姆拉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权限。一位美国国际法专家和这段历史的学者指责他除了其他罪恶外,还在国际谈判桌上撒谎,并故意破坏俄俄之间的条约”。但是,由于档案保密期的限制,英国严密封锁二战前后关于西藏事

务的档案。所以,兰姆与众多学者一样,当时没有继续研究1936—1947年间英国在麦线地区的活动情况。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Maxwell, N.)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长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①一书。该书论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起因、印度政府的边界政策、中印边境战争,以及战后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等。由于内维尔在此书中首次引用英国与印度政府的内部档案,该书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反响,并以法、德、汉、日等多种文字再版。但是,该书将论述的重点放在1947年之后印度政府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的相关政策上。对于1947年前英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的相关政策和活动方面,内维尔研究并不深入,但他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1914年“中英藏”召开西姆拉会议时,“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结果“麦克马洪线遂胎死腹中”。这是内维尔首次在国外学界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内维尔还将1962年前后印度政府实施的“前进政策”作了重点论述,但没有交代该政策从英印时代的继承渊源。

印度学者卡·古普特(Karunakar Gupta)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不畏印度政府迫害的勇气,于1974年出版了《被隐藏的边界》^②。他在此书中首次引用部分刚刚开放的印度事务部档案,揭露了1936年左右英国官员卡罗等人任意改编历史、销毁证据、伪造“艾奇逊条约集”,来炮制“麦克马洪线”的历史,并且最早提及了阿萨姆省政府在“华金栋”^③事件发生后制定的“前进政策”。但该书仍将研究重点放在了1947年印度民族政府成立后,印度政府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政策及其具体的活动,而涉及1937—1947年间英国在麦线以南地区的活动情况依然很少。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印边界冲突危机逐渐淡化、消逝,中印关

①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伦敦乔纳森·凯普公司1970年版。

② 中译名《中印边界秘史》,加尔各答米诺尔瓦联合出版社。

③ 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华金栋(Kingdon Ward)闯入西藏达旺地区,进行考察活动。但他在达旺地区的舍加恩(Shergaon)被西藏地方官员发现。事后,西藏噶厦就华金栋非法闯入达旺地区一事向英印提出了责问。英印遂决定利用此事,开始与噶厦交涉印藏边界线的具体勘分事宜。

系也逐渐走向友好。于是,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研究渐渐淡出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范围。尽管档案的利用越来越便捷,但鲜有学者再专门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直到1989年,英国学者兰姆推出了《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一书。该书下册的第十二节,将英国的一些重要决策作了简略的介绍,可以说,该节是《麦克马洪线》一书的续篇。兰姆显然较古普特深入了一步。首先,他从“华金栋事件”开始到二战结束前后,概括论述了英国政府在达旺地区的征税情况、派遣探险队情况,等等。其次,兰姆首次提到了英国印度事务部准备变更“麦克马洪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在拉萨指望重新划定麦克马洪线,以便将达旺和达旺寺留给西藏。他们试图将这个建议说成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让步,将它看作是可能诱使拉萨接受麦克马洪线其余部分作为边界的诱饵。他们失败了。拉萨当局没有上钩”。然而,遗憾的是,兰姆的观点仅此而止。英国的边界调整计划如何?前进政策的内容是什么?英印实施的过程如何?蒙古圈防御体系的具体计划是什么?英国在侵略麦线地区的政策有哪些冲突和矛盾?兰姆都未加以论述。

此后,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艾耶尔(R. C. Ayer)与查兰·尚迪拉雅(Charan Shandilya)等人先后发表《中印边界争端的新认识》、《中印争端》(*The Sino Indian Dispute*)等论著,他们的研究重点仍多为1947年以后印度政府时期麦线的相关问题,几乎未涉及笔者选题范围。被誉为“西藏近代史集大成者”的戈尔斯坦名著《西藏近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Tibet Modern History*, 1994年时事出版社汉译本),由于侧重研究西藏地方历史,只对1936年英藏关于达旺问题的争论作了简短论述。1997年,兰姆新著《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中曾提及英国在“麦线”地区的侵略活动是“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①再次揭露了英印侵略麦线地区的卑劣行为。

此外,除了以上著作基本能站在公正立场上之外,还有少数国外学者和侵

① 阿拉斯泰尔·兰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第2页,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版。

藏分子，否认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的存在。他们著书立说，为英国的殖民主义和印度的南亚霸权主义积极辩护。例如，老牌侵藏分子寇松（Curzon）在1924年出版《1904—1923牛津历史演讲集》，鼓吹“麦克马洪线”的合理性。他认为，由于清末中国政府加强了在西藏的“权威”，英国政府才冀图“以一条沿着山脊走的向北约60英里的科学的边界取代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既定的传统线，作为其在东北地区行政管辖的界线”，“它结合自然和战略的力量，并将进出两方面的关卡置于防御一方手中，迫使敌人在能够使用通道前去克服入口处的种种困难”。1960年2月英印强硬派侵藏分子卡罗，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文章，引用了自己一手安排伪造的文件作为证据来为英国侵略麦线地区辩护。这种虚伪的做法招来正直的学者的一致批评，正如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说，卡罗的目的是为“印度方面的无原则偏袒”。1978年，印度官员T. S. 穆尔蒂（Murty）又出版《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伪装成学者鼓吹印度官方的观点。他认为英印缔造的“麦克马洪线”还不是最完美的，而合理的“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他还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麦克马洪线”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有效承认即可”。可见其逻辑之荒谬。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由于资料、政治因素的限制，无论国民政府初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都未能系统研究中印边界的历史。1961年，在中印边界危机加剧时，中国政府本着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广泛搜集了中、英、印三国出版的地图，以及官方、私人的各种文件记载，特别是研究了印度政府所提的各种边界“要求及证据”，结果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内部资料）。该报告书引用中文、藏文资料翔实，尤其是利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为中国外交部在同印度政府的数次谈判中证实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由于英国档案的缺憾，仍未能利用外方资料进一步揭露印度的侵略行径。此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登载地图学家曾世英《关于论证中印东段国界资料的一些线索》、房建昌《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等文章，对麦线地理特点、麦线历史根源等作了简介。此后，1997年，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认为：英国约在清末兼并阿萨姆后，大体上确定了一条沿喜马拉雅山山脚

的边界线,即“外线”。由此,该文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外线”、“内线”、“红线”、“麦克马洪线”的异同问题。此后,王宏伟著《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谦平著《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三联书店2003年版)对英国在“麦线”以南活动的历史作了部分叙述。在大陆学者研究“麦线”的同时,台湾当局“蒙藏委员会”和部分学者也颇为重视祖国边疆史学的研究,汇编有《边情资料辑》《蒙藏地区敌情周刊》等刊物。其中欧阳竟无撰文《中印缅边界与麦克马洪线》《大旺调查记》,沈传均撰文《中印边界东段争论之分析》,分别探讨了滇缅北段未定界和中印之交涉、达旺地区的风土人情等,以及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台北学者孙子和撰文《英印侵略康藏边境述要》,曾简短述说了抗战期间英国侵略“麦线”地区的行径,提出英国侵藏的目的“在于‘制俄保印’”,但遗憾的是该文未能对此观点展开周详论述。此后,冯明珠撰写了《传言与真相》一文,利用台湾“国史馆”的现存大量档案,揭露了1914年“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人麦克马洪爵士与贝尔密谋策划攫夺中国领土的行为,但仍未能继续探讨此后的相关问题。

从中外学界研究“麦线”的总体情况来看,西姆拉会议与麦线的起源和产生、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中印军事冲突等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而对于二战前后英印在麦线地区的行动情况以及相关策略则往往被忽视。这是笔者冀图弥补的内容之一。

2.在英国干涉与破坏国民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方面,国内学者的著作颇丰富。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是国内较早研究此方面的著作。该书使用了原西藏“外交局”^①档案,部分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和西藏噶厦抵抗英国列强入侵的过程,但篇幅相对较小。此后,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昭义著《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著作以翔实的中外文史料揭露了各个时期英国侵藏政策、侵略手段的变化、发展,分析出相关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且对国外一些混淆是非、歪曲历史的论著予以抨击。《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以时代为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围绕英、俄侵藏的主题而展开

^① 1942年7月,西藏噶厦在亲英分子的鼓动下成立“外交局”,具体负责西藏地方与外国政府的官方往来,负责人索康扎萨。